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刘晓英¹, 张志恒¹, 牛文涛^{1,2*}

(1. 郑州大学 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2.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科创新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 2008—2022 年省级及以上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 基于 PMC 指数模型、文本分析单元编码等测算政策综合效力和政策工具使用力度, 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拓宽农民群体的非农就业渠道, 有助于提升这一群体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其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利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 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无显著影响。在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实践中, 供给型政策工具在创业后期支持不足, 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风险控制力度不足, 引致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效力的相对弱化。据此建议注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与风险防范、加强政策制定部门间的协同性。

关键词 农民工; 返乡创业政策; 工资性收入; 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25)05-0089-13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25.05.008

近年来,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已在乡村场域产生显著的就业带动效应, 帮助农民群体获得了更加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 提升了工资性收入水平^[1-4]。当前,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提高,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3 年的 9429.6 元持续增长至 2023 年的 21691.0 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8.6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 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从 2013 年的 38.7% 持续增长至 2023 年的 42.2%^①, 收入结构呈现从以务农收入为主向工资性收入为主转变的态势^[5-6]。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经营性收入, 也通过带动非农就业为农村居民提供工资性收入。相比于创业带来的经营性收入, 非农就业提供的工资性收入不仅更具稳定性, 对经济实力要求也低于创业, 能够带动更多农村居民特别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居民获得收入增长。因此, 返乡创业企业提供的工资性收入既能扩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受益群体, 也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 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优化农民群体收入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7-9]。实际上, 致力于拓宽非农就业渠道^[10], 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 党和政府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政策维度先后发布了诸多政策文本, 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赋能农民群体就业增收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 农民工返乡创业谱写乡村美好生活的时代图景正在逐步展开, 业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语境下能人返乡创业“乡村叙事”的重要内容。

当前关于返乡创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分析政策自身特点。这一层面的研究表明, 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 不同类型的返乡创业政策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一方面, 农

收稿日期: 2024-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本智造赋能产业工人高质量就业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23BJL045)。

*为通讯作者。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24)》。

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体系具有法定性、长远性等特点,但基础设施、土地、金融、财政、公共服务政策均需优化^[11]。另一方面,中国青年返乡创业政策工具多样但结构不均衡,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等问题^[12]。第二个层面研究政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这一层面的研究表明,返乡创业政策能够在农村居民就业、县域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13-14]。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各目标均有正向影响^[15]。创新创业政策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首先,从基于质性分析方法的政策评价研究来看,定性评价能够使对政策文本的评价更加全面和深入。借助扎根理论发现政策文本存在协调性较弱、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不合理等问题^[16]。以内容和话语分析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创业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有效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创业政策存在的差异性,相关研究表明以科索沃为代表的转轨经济体的创业政策话语线索似乎更加僵化,以荷兰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文本对创业的理解更加广泛,将其与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而不是像转轨经济体那样将这种现象简化为一种经济逻辑^[17]。其次,从基于定量分析方法的政策评价研究来看,定量评价能够使对政策效应的衡量更为清晰和客观。双重差分模型显示政府创业政策能促进城市创业^[18]。利用动态二元离散时间随机过程进行模型构建,对包含了风险投资和政府担保银行贷款两种青年创业企业融资支持途径的意大利创业法进行了分析,发现两种融资方式针对的青年创业企业的类型并不相同,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从而阐明了此类政策措施的所谓“任务分割”效应^[19]。

总的来讲,学者们普遍认同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之于农民群体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意义。尽管如此,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进行单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而关于政策体系的整体评价和优化研究实则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以双重差分法为主,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研究较少,较难提供精准化理论指导。当前亟待对如下问题进行回答:①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总体上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②政策工具的不同是否会引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效应的差异性?③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8—2022年政策文本,基于PMC指数模型等测算政策效力,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影响机制,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下农民就业增收致富目标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创业活动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至关重要^[20]。萨尔曼的创业模型表明人力资源、创业机会、外部环境和交易行为是创业的关键环节。政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在这些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首先,乡村地区因人口外流而缺乏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源,但农民工拥有丰富的非农就业经验和资本,熟悉当地环境,因此成为政策支持的主体。政策能够通过培训补贴和利用教育资源提升他们的创业能力,优化人力资源。其次,国家政策的增加和扩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通过减免税收和费用降低成本,建立创业孵化平台,乡村创业机会得以增加。再次,政府政策还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资本参与来改善外部环境。最后,政府政策鼓励乡村电商和金融机构开发针对返乡农民工的金融产品,能够降低融资难度,简化交易行为。政策支持返乡农民工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

第一,奠定经济基础。政策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缓解生产要素外流导致的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振兴乡村非农经济,从经济领域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的增长核算方程表明,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投入增加均会促进经济增长。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往往聚焦于非农领域^[21],在长期的外出务工经历中开拓了视野的返乡农民工本身可以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促进乡村非农经济增长。此外,外出农民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同样是促进乡村非农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

第二,解决社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亦面临下行压力,城市地区纷纷有“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的转型趋势^[22]。外出农民工面临非农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成本偏高等社会问题,致使外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水平下降,而留守农村的劳动者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也难以以为家庭带来较多的工资性收入。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使乡村地区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用工需求,增加了乡村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可以解决外出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能满足农村居民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就近就业需求,从而解决了制约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问题,为农村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保障。

第三,培育良好风气。尽管乡村创业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地区资源匮乏、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小等原因,创业活动往往优先选择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进行,乡村地区的创业氛围并不浓厚。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在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完善、促进消费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优化乡村地区创业条件,以此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乡村地区本身也具备创业成本低的天然优势,可以降低农民工创业风险。在政策支持与乡村自身优势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在乡村地区实现成功创业成为可能,其示范带动作用可以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投身乡村这片沃土,在乡村地区形成创新创业之风,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提供丰厚的文化土壤。

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需要多方面政策支持,包括增强创业意愿、提升创业能力和改善客观条件。政策工具的使用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方面支持至关重要,Rothwell等提出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较为契合^[23]。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发掘市场需求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供给型政策工具提供必要的资源,如土地、技术等;环境型政策工具通过税收激励和制度改革等手段改善创业环境。这三类政策工具分别通过吸引力、驱动力和间接影响力促进政策效力发挥,助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

H₂:需求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

2. 影响机制分析

政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

第一,增加非农就业岗位。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政策工具发挥效力,为外出农民工返回家乡就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可以在乡村地区形成众多的新创企业^[24-25]。这些新创企业可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其次,作为创业人员,返乡农民工不仅具有对本行业的投资需求,也比一般工薪阶层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26]。在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农民工回到乡村地区从事创业活动,在乡村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能够带动乡村地区更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在乡村地区催生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

第二,增强非农就业能力。首先,为就业人员技能培训提供培训补贴。通过政府为企业培训员工提供培训补贴,引导企业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对已经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使其劳动技能能够及时适应岗位要求的变化。

第三,提供非农就业保障。首先,通过建立信息采集制度,帮助农村劳动者找到非农岗位,提供非农就业信息保障。其次,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包括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以及职业介绍和就业服务补贴,提供非农就业财政保障。再次,通过建立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畅通仲裁“绿色通道”,提供非农就业司法保障。最后通过社会保险补贴和工伤保险补贴提供非农就业风险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₃: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通过提升非农就业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

二、数据收集与模型构建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政策文本主要通过三个渠道获取:中央和省级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搜索引擎如百度和必应。依据张扬等的相关性与规范性原则^[27],选定关键词进行搜索,重点搜集标题包含“返乡”和“创业”的政策,并以包含“乡村创新”等表述的政策作为补充。政策文本主要选取规范性文件和工作文件,排除答复、批复等非实质内容,剔除与农民工无关或与研究主题关联不强的政策,共收集到2008—2022年95份省级以上政策文本。区域创新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IRIEC)》,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中央、地方的各类统计年鉴。部分指标的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则以线性插值法补齐。

2. 模型设定

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构建以下固定效应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Policy_{it-1} + \sum Control + \xi_i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tag{1}$$

模型中,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Y_{it} 为*i*省 t 年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Policy_{it-1}$ 是*i*省 $t-1$ 年的政策效力。 $Control$ 是控制变量。 ξ_i 和 φ_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是随机扰动项,其余为变量系数。由于政策效力需要时间体现,模型设计时对政策效力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处理。统计分析显示,政策主要发布于2015—2022年,在此之前,政策文本数量较少;在此之后,部分变量难以获取。因此,本文选取2015—2022年作为研究时段。

3. 变量描述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百分比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参考商潇等的研究^[28-29],对于政策综合效力,本文通过政策一致性指数(PMC)进行衡量,对于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本文以PMC指数为权重,通过对政策工具数量进行加权计算的方式加以衡量。

(3)控制变量。参考关于农村居民收入或非农收入相关的文献^[30-31],选取能源消耗水平、乡村水资源利用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水平、社会需求水平、地区产业结构等变量作为该模型的控制变量。

(4)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非农就业水平,以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之和的对数值进行衡量。各变量的具体内涵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与测度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的对数值
中介变量	非农就业水平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的对数值
	政策效力	综合政策效力 PMC 指数测算结果的对数值
核心解释变量	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的对数值
	政策工具使用力度	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的对数值
		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的对数值
	资源利用水平	能源消耗水平 农村用电量的对数值
		乡村水资源利用水平 有效灌溉面积的对数值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区域创新水平 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对数值
		社会需求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值
控制变量	地区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地区发展水平	农业生产规模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对数值
		乡村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值
		医疗基础设施水平 村卫生室数的对数值
		乡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对数值
		农业劳动者规模 农林牧渔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对数值

三、政策综合效力测度——PMC 指数模型

1. 变量选取与参数识别

本文以搜集到的 95 份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为对象,以 Estrada 等提出的政策评价核心变量为基础^[32],同时参考张永安等有关创新创业政策的变量设定方式^[33],并结合搜集到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进行进一步修改,最终设定了 12 个一级变量,并在一级变量之下选取了 49 个二级变量(表 2)。

表 2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变量来源
政策性质(X_1)	引导($X_{1,1}$)	监管($X_{1,2}$)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 ^[34]
	建议($X_{1,3}$)	诊断($X_{1,4}$)	
	识别($X_{1,5}$)		
政策时效(X_2)	长期($X_{2,1}$)	中期($X_{2,2}$)	基于施杨等的文章修改 ^[35]
	短期($X_{2,3}$)		
政策功能(X_3)	资源供给($X_{3,1}$)	方向引领($X_{3,2}$)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 ^[34]
	产品创新($X_{3,3}$)		
发布机构(X_4)	国务院($X_{4,1}$)	国家部委($X_{4,2}$)	基于施杨等的文章修改 ^[35]
	省市地委($X_{4,3}$)	省市厅局($X_{4,4}$)	
	其他($X_{4,5}$)		
保障措施(X_5)	能力保障($X_{5,1}$)	生活保障($X_{5,2}$)	基于吴卫红等的文章修改 ^[36]
	兜底保障($X_{5,3}$)		
政策客体(X_6)	农民工($X_{6,1}$)	创业企业($X_{6,2}$)	基于臧维等的文章修改 ^[37]
	社会组织($X_{6,3}$)	政府($X_{6,4}$)	
政策等级(X_7)	国家级($X_{7,1}$)	省级($X_{7,2}$)	基于臧维等的文章修改 ^[37]
	统筹协调($X_{8,1}$)	组织建设($X_{8,2}$)	
制度体系(X_8)	分工明确($X_{8,3}$)	权责清晰($X_{8,4}$)	基于杜宝贵等的文章修改 ^[38]
	运行高效($X_{8,5}$)		
政策评价(X_9)	目标明确($X_{9,1}$)	方案翔实($X_{9,2}$)	基于牡丹丽等的文章修改 ^[39]
	依据充分($X_{9,3}$)		
激励措施(X_{10})	资金激励($X_{10,1}$)	制度激励($X_{10,2}$)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 ^[33]
	舆论激励($X_{10,3}$)	荣誉激励($X_{10,4}$)	
	榜样激励($X_{10,5}$)	要素激励($X_{10,6}$)	
	人才激励($X_{10,7}$)		
政策领域(X_{11})	经济领域($X_{11,1}$)	社会领域($X_{11,2}$)	基于 Estrada 等的文章修改 ^[32]
	文化领域($X_{11,3}$)	政治领域($X_{11,4}$)	
	环境领域($X_{11,5}$)	法律领域($X_{11,6}$)	
政策重点(X_{12})	成果转化($X_{12,1}$)	市场导向($X_{12,2}$)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 ^[33]
	制度构建($X_{12,3}$)		

2. 构建多投入产出表

根据评价指标构建多投入产出表如表 3 所示。

3. PMC 指数的计算

根据 Estrada 等的研究,PMC 指数的计算步骤如下^[32]:首先,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变量放入多投入产出表;其次,根据政策文本分析结果和变量描述,参照公式(2)和公式(3),邀请 5 位农业领域专家对各二级变量进行打分,以确定其得分,并通过公式(4)计算一级变量数值;最后,按照公式(5)计算出每一项政策的 PMC 指数。

$$X \sim N[0,1]$$

(2)

$$X=\{XR:[0\sim 1]\}$$
$$X_i\left(\sum_{j=1}^n\frac{X_{ij}}{T(X_{ij})}\right),i=1,2,3\cdots$$
$$PMC=X_1\left(\sum_{i=1}^5\frac{X_{1i}}{5}\right)+X_2\left(\sum_{j=1}^3\frac{X_{2j}}{3}\right)+X_3\left(\sum_{k=1}^3\frac{X_{3k}}{3}\right)+$$
$$X_4\left(\sum_{l=1}^5\frac{X_{4l}}{5}\right)+X_5\left(\sum_{m=1}^3\frac{X_{5m}}{3}\right)+X_6\left(\sum_{n=1}^4\frac{X_{6n}}{4}\right)+$$
$$X_7\left(\sum_{o=1}^2\frac{X_{7o}}{2}\right)+X_8\left(\sum_{p=1}^5\frac{X_{8p}}{5}\right)+X_9\left(\sum_{q=1}^3\frac{X_{9q}}{3}\right)+$$
$$X_{10}\left(\sum_{r=1}^7\frac{X_{10r}}{7}\right)+X_{11}\left(\sum_{s=1}^6\frac{X_{11s}}{6}\right)+X_{12}\left(\sum_{t=1}^3\frac{X_{12t}}{3}\right)$$

其中, $T(X_{ij})$ 为某个一级变量下二级变量的总个数; i 为一级变量的编号, j 为对应一级变量下二级变量的编号。

参照 Estrada 等的研究^[32,40], 本文按照 PMC 得分对不同政策的档次进行划分, 其中 0~6 分为不良, 6~8.4 分为合格, 8.4~10.8 分为优秀, 10.8~12 分为完美。根据此划分标准对所搜集到的政策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 在搜集到的 95 份政策文本中, 不良等级的政策有 31 份, 合格等级的政策有 45 份, 优秀等级的政策有 19 份, 完美等级的政策为 0 份。由此可知, 当前返乡创业政策多数达到合格以上水平, 但优秀等级以上政策数偏少, 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4. PMC 指数各变量得分情况

PMC 指数由公式(5)和(6)计算得出, 得分结果显示, 各维度普遍表现较好, 但发布机构这一维度得分较低, 表明现有政策的发布以各部门独立发文为主, 多部门之间的联合发文比例较低。利用戴布拉图直观展示政策一级变量的 PMC 指数得分分布, 得分越高则变量越靠外围(图 1)。戴布拉图的结果表明当前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效力发挥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不足。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发布机构”这一维度呈现出最为明显的内缩态势, 这一分析结果与 PMC 指数的得分结果相结合, 共同印证了当前政策体系各部门之间协同性不足的“短板”。事实上,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政策发布应当以多部门联合发布为主。第一, 从涉及领域来看, 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涉及领域广的特点, 包括财政税收、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因而在政策制定上要求政府各部门进行跨领域合作。第二, 从资源需求来看, 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资源需求量大的特点。一方面, 创业本身即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活动^[41]; 另一方面, 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规模也十分庞大, 截至 2022 年 3 月, 返乡入乡创业人数达到 1120 多万, 且其中 70% 为返乡农民工^[42]。规模巨大的资源调度需要通过多部门联合发布政策以整合各类资源, 减少资源重复供给造成的浪费问题, 提高工作效率。

$$PMC=\begin{bmatrix}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 X_6 \\ X_7 & X_8 & X_9 \\ X_{10} & X_{11} & X_{12} \end{bmatrix}$$

(6)

5. 典型政策分析

通过分析河南省、贵州省、福建省的代表性政策文件, 探讨各地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特征。选取的文件包括河南省的《财政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 条政策措施》(P13)、贵州省的《“雁归兴

(3)

(4)

(5)

表 3 多投入产出表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X_1	$X_{1:1} X_{1:2} X_{1:3} X_{1:4} X_{1:5}$
X_2	$X_{2:1} X_{2:2} X_{2:3}$
X_3	$X_{3:1} X_{3:2} X_{3:3}$
X_4	$X_{4:1} X_{4:2} X_{4:3} X_{4:4} X_{4:5}$
X_5	$X_{5:1} X_{5:2} X_{5:3}$
X_6	$X_{6:1} X_{6:2} X_{6:3} X_{6:4}$
X_7	$X_{7:1} X_{7:2}$
X_8	$X_{8:1} X_{8:2} X_{8:3} X_{8:4} X_{8:5}$
X_9	$X_{9:1} X_{9:2} X_{9:3}$
X_{10}	$X_{10:1} X_{10:2} X_{10:3} X_{10:4} X_{10:5}$ $X_{10:6} X_{10:7}$
X_{11}	$X_{11:1} X_{11:2} X_{11:3} X_{11:4} X_{11:5}$ $X_{11:6}$
X_{12}	$X_{12:1} X_{12:2} X_{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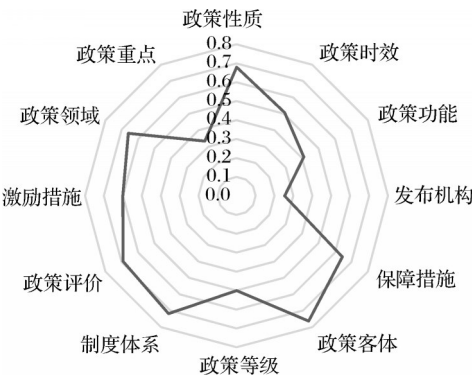


图 1 政策平均值的戴布拉图

贵”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行动计划》(P51)和福建省的《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十二条措施》(P91)。 PMC 矩阵的构建基于公式(6),而以P13为例构建的具体公式见式(7),以此绘制三份政策曲面图^①。P13的 PMC 指数为8.99,表现优秀,其特点在于内容全面。P51的 PMC 指数为7.15,表现合格,其特点在于具有明确的政策规划。P91的 PMC 指数为8.45,同样表现优秀,特点在于分工明确。通过戴布拉图,直观对比不同政策文本的一级变量得分(图2),发现所有政策在发布机构(X_4)维度得分最低,这与 PMC 指数分析结果一致。

$$PMC(P13)=\begin{bmatrix} 0.60 & 1.00 & 0.67 \\ 0.20 & 1.00 & 1.00 \\ 0.50 & 1.00 & 1.00 \\ 0.86 & 0.83 & 0.33 \end{bmatrix}$$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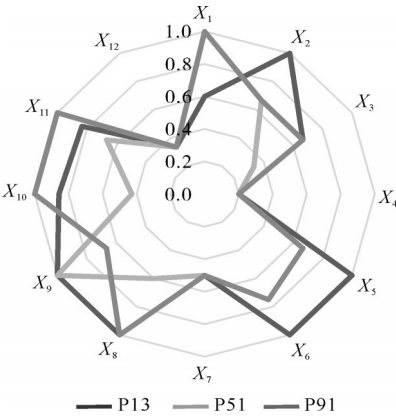


图2 政策 P13、P51、P91 的戴布拉图

四、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测度

1. 政策工具类型划分

参考相关研究^[12,43],本文对政策工具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分。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引导和拉动,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市场机会。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项目共建、示范引领、产业扶持、招才引智、资源整合、互助合作、政府购买、社会参与。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驱动力,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力。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用电保障、公共服务、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土地供给、财政补贴、用工保障。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间接影响力,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外部环境。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监督约束、风险防范、金融支持、平台建设、社会保障、组织保障、宣传引导、税费优惠。

2.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步骤如下:第一,逐句阅读提炼关键信息形成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第二,在NVivo 12 Plus软件中以“政策编号—条款编号”形式编码。第三,每条政策文本分析单元与一类政策工具相对应,并逐条加以标注(表4)。

表4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内容编码表节选

编号	政策名称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	文本编码	政策工具类型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	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创业线上线下基础设施建设	1—1	供给型—基础设施
.....
1126	关于深入实施“我兴楚乡创在湖北”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的通知	加强返乡创业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提供信息发布、用工指导、人才招聘等服务	28—40	供给型—公共服务
.....
4441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支持、促进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力营造创业、兴业、乐业的良好环境	95—76	环境型—宣传引导

3. 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测度结果

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与其 PMC 指数相乘,得到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得分如表5所示。

① 政策曲面图已省略,留存备索。

表 5 政策测度部分测度结果						
政策	P1	...	P45	...	P94	P95
需求型	54.20	...	38.56	...	46.83	65.03
供给型	63.23	...	215.93	...	206.07	268.24
环境型	117.43	...	239.07	...	224.80	284.50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6结果显示,政策总体上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分析表明,需求型政策工具对提升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面效果,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没有明显影响。加入资源利用水平控制变量后,发现能源消耗水平对工资性收入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水资源利用水平对其无显著影响。考虑地区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支持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工资性收入的正面影响,而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₁得到验证,H₂被拒绝。

表 6 基准回归结果						N=217
变量	(1)	(2)	(3)	(4)	(5)	(6)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综合政策效力	0.045**(0.019)		0.047**(0.018)		0.046**(0.017)	
需求型政策工具		0.089*** (0.030)		0.096** (0.036)		0.089*** (0.032)
供给型政策工具		0.007(0.062)		0.015(0.058)		0.044(0.046)
环境型政策工具		−0.059(0.076)		−0.073(0.077)		−0.096(0.066)
能源消耗水平			0.023** (0.010)	0.025** (0.010)	0.029** (0.011)	0.031*** (0.011)
乡村水资源利用水平			0.096(0.151)	0.080(0.155)	0.105(0.149)	0.100(0.150)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0.256(0.178)	−0.311(0.195)
区域创新水平					0.170(0.290)	0.158(0.291)
社会需求水平					0.189* (0.108)	0.207* (0.109)
地区产业结构					0.003(0.014)	0.007(0.012)
农业生产规模					0.200(0.195)	0.215(0.181)
乡村机械化水平					−0.013(0.098)	0.010(0.094)
医疗基础设施水平					0.330* (0.168)	0.311* (0.169)
乡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0.087(0.206)	−0.099(0.217)
农业劳动者规模					−0.039*** (0.012)	−0.034*** (0.011)
常数项	3.507*** (0.058)	3.500*** (0.101)	2.696** (1.103)	2.808** (1.123)	−1.647(3.490)	−1.279(3.579)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的 R ²	0.036	0.072	0.103	0.146	0.186	0.229

注:括号内为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从地区发展水平来看,社会需求水平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市场供需理论指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社会需求增加时,企业加快生产和创新,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工资水平,最终促进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而言,由于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因而社会需求的变化通常来自非农领域,社会需求增加主要促进非农经济繁荣,进而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医疗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健康状况影响农村居民工作能力,进而影响工作效率和失业

风险,不良的健康状况会减少农村居民从事高水平非农就业的机会。应当加强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健康保障,促进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劳动者规模越大,越抑制工资性收入增长。农村居民在农业领域投入的劳动力越多,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少,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也越少。加快农业现代化,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提升劳动者素养,增强非农就业能力,是促进乡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2. 进一步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 H_1 ,但却与 H_2 的结论不同。为解释这一现象,对搜集到的95份政策文本的政策工具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分析发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初期阶段,却忽略了对后续阶段的支持。创业成功需要全程的政策支持,包括前期的资源准备如“土地供给”“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等政策工具,创业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等政策工具,以及后期的“用电保障”“用工保障”等为企业正常运营提供保障的政策工具。尽管如此,目前政策工具中97%集中在创业前期和中期,后期支持不足,导致农民工创业困难,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政策效果。

第二,环境型政策工具缺乏对环境风险的控制与防范。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中,“监督约束”与“风险防范”占比过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失败概率增大。首先,“监督约束”占比过小导致市场混乱,增大创业失败风险。其次,“风险防范”占比不足,企业不仅缺乏应对手段,也缺少兜底保障机制。这两项政策工具的缺乏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效力的发挥造成不利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创业风险会随着创业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环境型政策工具虽然能够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但随着创业人数的增加,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也会增强,从而提高创业风险,降低企业盈利能力^[44]。因此,若无风险控制措施,环境型政策工具越多,企业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会越弱,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越低。针对创业人数增加带来的创业风险问题,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的互助合作工具能够通过加强返乡农民工之间的沟通,构建合作机制以缓解竞争压力、实现错位发展,从而降低因返乡创业人数过多带来的同质化竞争。供给型政策工具能够通过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实力以提高风险承受能力。但环境型政策工具风险控制措施的缺失将导致政策效力不仅难以发挥,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除了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以外,政策工具效果受限的可能原因还包括农民工自身局限性和文化冲突。首先,农民工利用资源能力有限,影响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由于农民工学历低,接受培训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利用资源,影响创业绩效,削弱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45-47]。随着农民工创业素质提升,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可能增强。另一方面,农村创业环境面临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冲突。返乡创业企业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经营,受到正式规章制度和人情伦理的双重影响,导致文化嵌入性困境。由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效力主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关,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效力主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有关,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主要与返乡创业企业的日常经营有关,企业日常经营需要与多个乡村主体建立人际关系,遵循人情伦理,因此环境型政策工具受此类文化嵌入性困境影响最大。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生产效率,降低政策工具效力^[48]。政府应引导农民工应对文化冲突,改善创业效果。

3. 稳健性检验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可能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高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和税收,提升政策支持能力。因此,本文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采用滞后一期政策支持数据减少了内生性问题,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尽管如此,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可靠性仍是必要的(表7)。本文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通过使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且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通过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第二,数据缩尾处理。为避免极端值影响,进行了双侧

1%的缩尾处理,结果显示政策综合效力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需求型政策工具实现。第三,缩小样本范围。剔除四个直辖市重新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影响不显著。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工资性收入	(2)工资性收入	(3)工资性收入	(4)工资性收入	(5)工资性收入	(6)工资性收入
综合政策效力	0.047**(0.018)		0.044**(0.017)		0.050**(0.020)	
需求型政策工具		0.089**(0.032)		0.087**(0.032)		0.081**(0.037)
供给型政策工具		0.060(0.057)		0.047(0.046)		0.029(0.045)
环境型政策工具		-0.111(0.079)		-0.099(0.067)		-0.067(0.0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17	217	217	217	189	189
调整后的R ²	0.901	0.905	0.178	0.218	0.278	0.304

六、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基于城市非农就业能够获取收益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这一理性认识。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有望进一步在乡村地区催生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帮助农村居民就近就业,提升工资性收入。本文现以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如何通过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表8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可以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从政策工具的视角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可以提升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但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无显著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从岗位数量、就业能力、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增加非农就业人数。首先,政策为乡村地区非农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乡村地区形成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从而使农村居民拥有了更为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在过去,农村地区的非农企业较少,难以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岗位,这是农村劳动者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返乡创业政策鼓励乡村创业,有助于新创企业的培育和发展。同时通过返乡农民工带来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也能促进乡村非农经济繁荣发展,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创业行为及企业集聚行为,促进乡村非农岗位数量增长,增加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机会。其次,政策通过增强非农就业能力使农村居民能够胜任更多类型非农就业岗位。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培训支持,增强非农就业能力,提高非农就业人数。最后,政策鼓励各地区搜集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同时在岗位稳定、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使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非农就业岗位。

同时,表8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提升对工资性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结合表6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证明,非农就业水平提升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方面具有中介效应。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提升非农就业水平,是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直接促进和间接促进两种类型。直接效果来看,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优化了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农村居民获取更多工资性收入。从间接促进效果来看,非农就业水平提升使农村劳动者接触先进生产工具,开拓视野,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获取工资性收入的能力。由此证实了H₃。

表 8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N=217
变量	(1)非农就业水平	(2)非农就业水平	(3)工资性收入	(4)工资性收入
综合政策效力	0.230 [*] (0.114)		0.035 [*] (0.019)	
需求型政策工具		0.295 [*] (0.165)		0.077 ^{**} (0.031)
供给型政策工具		0.399(0.354)		0.028(0.038)
环境型政策工具		−0.464(0.476)		−0.077(0.055)
非农就业水平			0.046 [*] (0.024)	0.042 [*] (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调整后的 R ²	0.550	0.560	0.274	0.301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其次,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但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无显著影响。再次,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数量结构不协调。供给型政策工具存在对创业后期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存在风险控制力度不足的问题。最后,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机制。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全过程支持。当前返乡创业政策只将重点放在了如何促进农民工返乡方面,而对于农民工返乡之后的后续支持则较为缺乏,使农民工在返乡之后的创业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第二,注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防范与补偿。首先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通过降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控制风险,为农民工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实现致富增收创造条件,其次要加强兜底保障机制的建设,使创业失败的农民工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后顾之忧。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对 PMC 指数各维度的分析表明,现有政策的制定存在部门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加强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

参 考 文 献

[1] DÉMURGER S, XU H.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0): 1847-1861.

[2] XU Z H, LIU Y G, LIU K Z.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 in Henan province[J].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7, 58(1): 114-140.

[3] 王轶,刘蕾.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 2022(9):44-62.

[4] 刘赛特,陈子云.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优化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 2023(6):99-107.

[5] 翁鸣.中国农业转型升级与现代农业发展——新常态下农业转型升级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 2017(4):88-95.

[6] 孙婧芳,蔚金霞,杜凤莲.新冠疫情冲击下农业对非农失业的缓冲作用:农业劳动力蓄水池功能的再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 2024(11):42-60.

[7] 葛岩,吴海霞.非农收入、土地流转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J].管理评论, 2023, 35(8):3-14.

[8] 陶颖,王文涛,陈启亮,等.宗教信仰与农户非农收入——信教有利于增收吗?[J].中国经济问题, 2017(4):88-97.

[9] 杨柠泽,周静.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农民非农收入增加?——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 2019, 36(5):41-48.

[10] 牛文涛,郑景露,唐軻.农村三产融合赋能农民就业增收再审视——基于河南省孟庄镇、龙湖镇、薛店镇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

- 济问题, 2022(8):132-144.
- [11] 赵显洲, 罗伯·金·马杰里森, 杨丽丽. 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量化评价[J]. 学术交流, 2023(4):147-160.
- [12] 邓国彬. 我国青年返乡创业政策的量化研究——以政策工具为视角[J]. 社会科学家, 2023(1):143-152.
- [13] 杨建海, 曹艳, 王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应[J]. 改革, 2021(9):104-120.
- [14] 黄祖辉, 宋文豪, 叶春辉, 等.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24-43.
- [15] 李俊蓉, 林荣日.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双重差分检验[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3, 45(1):1-16.
- [16] 程华, 娄夕冉.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政策研究: 政策工具与创新创业过程视角[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9, 36(21):141-147.
- [17] BERJANI D, VAN BURG E, VERDUIJN K. Discursive threads in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ex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Kosovo[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23, 35(3-4):297-316.
- [18] 曾婧婧, 温永林. 政府创业政策对城市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国家创业型城市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管理, 2021, 43(4):55-70.
- [19] GIRAUDO E, GIUDICI G, GRILLI L.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and the financing of young innovative companies: evidence from the Italian startup act[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9):103801.
- [20] 林嵩, 谷承应, 斯晓夫, 等. 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23, 58(3):40-58.
- [21] 赵浩兴, 张巧文. 内地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沿海地区外力推动: 一个机制框架[J]. 改革, 2011(3):60-68.
- [22] 黄祖辉, 胡伟斌. 中国农民工的演变轨迹与发展前瞻[J]. 学术月刊, 2019, 51(3):48-55.
- [23]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 [24] 张亮, 李亚军. 就近就业、带动脱贫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J]. 改革, 2017(6):68-76.
- [25] BERNARDI C D, PEDRINI M.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getting eco-drunk by feeling environmental passion [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6:120367.
- [26] KRICHEVSKIY D. A consumption-based measure of the monetary rewards to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 2014, 3(1):49-71.
- [27] 张扬, 顾丽梅. 中国创新型城市政策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J]. 科学管理研究, 2021, 39(6):8-16.
- [28] 商潇. 金融支持、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视角[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9.
- [29] 刘慧敏, 耿闯, 袁紫薇. 政策工具视角下 PPP 政策的融资效率效应和可持续效应研究[J]. 软科学, 2022, 36(6):33-39.
- [30] HWANG J H, LEE S W. The effect of the rural tourism policy on non-farm income in South Ko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501-513.
- [31] 何宜庆, 熊子怡, 张科, 等. 政府推动型返乡创业能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双重差分的经验评估[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4):1-14, 27.
- [32] ESTRADA M A R. Policy modeling: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1, 33(4):523-536.
- [33] 张永安, 鄧海拓. 国务院创新政策量化评价——基于 PMC 指数模型[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17):127-136.
- [34] 张永安, 耿喆.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政策的量化评价——基于 PMC 指数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 2015, 35(14):26-31.
- [35] 施杨, 赵曙明. 高层次创业人才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研究——基于江苏 6 个典型地区的调研[J]. 科学管理研究, 2021, 39(5):129-133.
- [36] 吴卫红, 盛丽莹, 唐方成, 等. 基于特征分析的制造业创新政策量化评价[J]. 科学学研究, 2020, 38(12):2246-2257.
- [37] 臧维, 李甜甜, 徐磊. 北京市众创空间扶持政策工具挖掘及量化评价研究[J]. 软科学, 2018, 32(9):56-61.
- [38] 杜宝贵, 王欣. 全面改革创新试验政策量化评价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5):41-50.
- [39] 杜丹丽, 原琳, 高琨. 2010—2017 年京津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政策评价[J]. 中国科技论坛, 2019(10):100-109.
- [40] 汤匀, 李岚春, 岳芳, 等. 全球碳中和战略行动政策量化评价与前沿发展趋势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4, 8(7):1-20.
- [41] 何晓斌, 柳建坤. 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5):48-63.
- [42] 江帆, 宋洪远. 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历史方位与实现路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23-33.
- [43] QIN M, YUE C X, DU Y W. Evolution of China's marine ranching polic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J]. Marine policy, 2020, 117:103941.
- [44] 曹宗平. 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衍生机理与治理研究——基于从众效应与风险识别能力维度[J]. 广东社会科学, 2021(3):16-25, 254.
- [45] 张秀娥, 郭宇红.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困境及其化解之策[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11):244-246.
- [46] 钟云华, 黄小宾. 大学生创业失败修复扶持政策的现状审思与发展理路——基于政策工具分析视角[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101-113.

[47] 郑礼肖. 劳动者作用的全面提升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迈向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经济学家, 2023(10):14-22.

[48] 祝振兵, 许晟, 张帆. 主动性人格、创新行为与农民创业绩效[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2):103-115.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W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LIU Xiaoying, ZHANG Zhiheng, NIU Wentao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poli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this paper uses policy text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8 to 2022 as the data source. Based on the PMC index model and text analysis unit coding,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licy tools usage are calculate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inally constructed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reveal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on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policies can help improve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this group by expanding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annels. Howev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tools on wage income vary. Demand oriented policy tool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raising the w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while supply oriented and environment oriented policy tools show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practice, supply oriented policy tools lack sufficient suppor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nvironment oriented policy tools exhibit inadequate risk control, leading to a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ir policy effectiveness. Accordingly, it is recommended to enhance support and risk prevention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mong policy-making department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policy for returning to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wage income; policy tools

(责任编辑:余婷婷)